

语言地理类型学

〔日〕

桥本万太郎 著

余

志

鸿

译

YUYAN DILI
LEIXINGXUE

北京大学出版社

语言地理类型学

〔日〕桥本万太郎 著

余志鸿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语言地理类型学

〔日〕桥本万太郎著 余志鸿译

责任编辑：胡双宝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45千字

1985年2月第一版 1985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统一书号：9209·41

定价：1.05元

序

德·索绪尔区分共时的和历时的语言研究方法的学说，给本世纪的语言研究带来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积极的方面人所共知，用不着说。消极的方面，指的是由这种学说导致的把对语言的历史研究和断代描写截然分开，看成是毫不相干的东西的倾向。叶斯泊森的巨著 *A Modern English Grammar*，由于书名里有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而受到指责，认为描写“现代”英语而追溯“历史”是自相矛盾。汉语研究自然也受到了这种思潮的影响。就国外说，研究汉语的年轻一代的学者里，关心历史的比起上一代汉学家来要少得多。就我国国内来说，研究现代汉语的人往往只研究普通话，不但不关心历史，把方言研究也看成隔行。画地为牢，不愿越雷池一步。这不管对本人说，还是对学术发展来说，都不是好事。

桥本先生的书冲出了这种思潮的藩篱，高瞻远瞩，一空依傍。因为站得高站得远，所以能摆脱种种障碍和约束，看到在低处近处看不到的东西。读者可以不完全同意书中的某些观点和结论，但是这部书能够帮助我们扩大视野，开拓思路则是毫无疑问的事。

桥本先生素以方面广、著述多为同行称道。先生方当盛年，今后肯定还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我特别希望他能够

直接用中文为中国读者写书写论文。因为他的中文够好的，
而中国语言学界懂日文的却实在太少，至少目前是如此。
是为序。

朱 德 熙

一九八五年初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序	朱德熙
汉文版前言	(1)
前 言	(5)
第一章 语言的发展	(11)
1.1 语言发展的研究	(11)
1.1.1 牧畜民型语言	(12)
1.1.2 农耕民型语言	(14)
1.2 基本词汇的差异	(22)
1.3 语言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	(25)
1.4 区域语言学和语言的波形扩散	(29)
1.5 区域特征和音韵对应	(30)
第二章 句法结构的推移	(34)
2.1 语言结构的连续体	(34)
2.2 句法结构的逆行和顺行	(35)
2.3 南方汉语的顺行结构	(41)
2.4 “横”的推移和“纵”的演变	(44)
2.4.1 时·体标志的南北型	(50)
2.4.2 名词短语结构的区域性推移	(55)
2.4.3 名词短语结构的“纵”的演变	(66)
第三章 基本词汇的推移	(72)
3.1 “江”“河”的分布和历史	(72)

3.2	否定词的区域性推移	(76)
3.3	否定词的“纵”的变化	(82)
3.4	类别词的本质	(85)
3.4.1	类别词分布的区域性推移	(91)
3.4.2	类别词的“纵”的变化	(97)
第四章	音韵结构的推移	(104)
4.1	音节结构的区域性推移	(104)
4.2	声调结构的区域性推移	(110)
4.3	词素结构的区域性推移	(113)
4.4	超语段音位的区域性推移	(115)
4.4.1	音调重音音韵学	(116)
4.4.2	朝鲜语词音调的区别性特征	(117)
4.4.2.1	庆山方言的词音调系统	(122)
4.4.2.2	单音节两短音节的音调	(129)
4.4.2.3	朝鲜语词音调的音韵功能	(132)
4.4.2.3.1	构成短语的词音调派生	(134)
4.4.2.3.2	构成复合词的词音调派生	(142)
4.4.3	庆尚道方言的词音调模式	(145)
4.4.3.1	庆西型单词音调	(147)
4.4.3.2	庆东型词音调	(151)
4.4.3.3	庆南型词音调	(153)
4.4.4	词音调系统的变化原理	(158)
4.4.4.1	庆东型和庆西型	(158)
4.4.4.2	庆东型和庆南型	(163)
4.4.5	朝鲜语单词音调系统的区域性推移	(167)
4.5	音高和重音	(168)

4.6	从声调语言移向重音语言	(171)
4.6.1	加重重音支配的音调	(171)
4.6.2	声调和加重重音的相互依存	(177)
第五章	结 论	(184)
5.1	地理类型学家所说的“祖语”	(184)
5.1.1	词汇的同化	(187)
5.1.2	词汇和句法的同化	(189)
5.1.3	词汇、句法和音韵系统的同化	(197)
5.2	总结	(198)
	主题索引	(205)
	人名索引	(214)
	译后记	(219)

第一图	日语顺行结构例	(37)
第二图	英语逆顺行结构例	(38)
第三图	英语顺行结构例	(38)
第四图	亚洲各语言	(39)
第五图	满语逆行结构例	(40)
第六图	临高话顺行结构例	(41)
第七图	顺逆行结构曲线图	(46)
第八图	顺逆行结构统一例	(49)
第九图	方言地名图	(62)
第十图	朝鲜语方言地名图	(119)
第十一图	上声词句的句式(1)	(176)
第十二图	上声词句的句式(2)	(176)

汉文版前言

作者写这本小书的意图是，阐明现代语言学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语言为什么会变化。这个问题，似乎只关系到历史语言学。自从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倡导之后，严格区分语言的历时的和共时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近代语言学家的常识。但本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以后，世界社会科学研究回到了健康的理性主义，语言学家发现了一个非常普通的道理：既然世界上的语言没有一个是新产生的，既然它们的结构和系统都有其历史背景，那么，各个语言共时态里所能见到的各种规律性和非规律性，应当说都是历史变化的产物。如果共时语言学家的任务是发掘这些规律而完成对该语言最合理的结构描写的话，语言为什么会变化这个问题跟共时描写语言学直接有关，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换言之，语言为什么会变化这一问题，不仅是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出发点，而且是它的落脚点。

为了了解语言为什么会变化，我们首先应当知道语言是怎样变化的。提出语言怎样变化这个问题，我们所要阐明的是这些变化的实际过程和机制，而不是语言结构系统变化结果的平面描写。一说到语言变化过程和机制，我们立刻会发觉，语言学家旧有的知识过分依赖印欧语发展资料了。印欧语自古以来分散到欧亚各地，很多语族各自独立地发展。但是，世界上的语言并不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尤其是东亚大

陆语言的发展，基本上是由东方文化中心地的语言缓慢地同化周围语言的过程。因此，语言结构的历史变化和地域推移的对应相当整齐。作者的意图是根据东方语言发展史的事实和资料，建立新的、更为普通的语言发展理论。

本书原版印刷的时候，作者正在中亚进行野外调查，未能读到校样。书一出来，就发现有很多错字，本拟马上修改，只是一直没有时间。而更为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可笑的是，作者写这本书之前，没有访问过中国大陆，没有机会向中国大陆的朋友请教。作为一本讨论东方语言结构发展的书，这是一个最大的、最严重的欠缺。幸好，1981年秋，作者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的邀请，首次访问了中国。次年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之后，根据日本学术振兴会和中国教育部之间的交换协议，在北京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半年。两次访问期间，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山西省语言学会、山西省方言研究会、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市语文学会、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中南民族学院、兰州大学、甘肃省语言学会、兰州市语言学会、青海师范学院、青海民族学院、青海省语言学会、南宁师范学院、桂林民族师范学校等单位作过学术报告，讨论东亚各语言结构类型的各种问题，并借机就本书所述语言事实及各种问题重加讨论，同时做了可能的补充和修正，以就教于各位新老朋友。根据这些学术经历和所受的启发，北京大学中文系又提供机会，使我得以修改这本书。作者在这里对向景洁、朱德熙、叶蜚声、陆俭明诸先生以及系里其他朋友所给予的指导、关照、帮助和友谊，

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汉文本的出版，有赖于几位朋友的友谊。上海中医学院余志鸿先生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念研究生的时候，为翻译本书，单是跑上海图书馆，每天就要花两个小时。作者在美国时，复旦大学中文系把译稿油印出来，余先生寄到西雅图一本，要作者校读。他和他的老师胡竹安先生在《国外语言学》1981年第4期上介绍了本书的内容。北大中文系胡双宝先生两读余先生的译稿，不只对行文，而且对内容也提出了很多意见，做了全面的加工。此外，北大东语系徐昌华先生校读了序言及头一章，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朱德熙先生细心审阅了译稿，并愿为写序，向中国朋友介绍本书。所以，这本书可以说是国际友谊和合作的结果，与其说是译本，不如说是增订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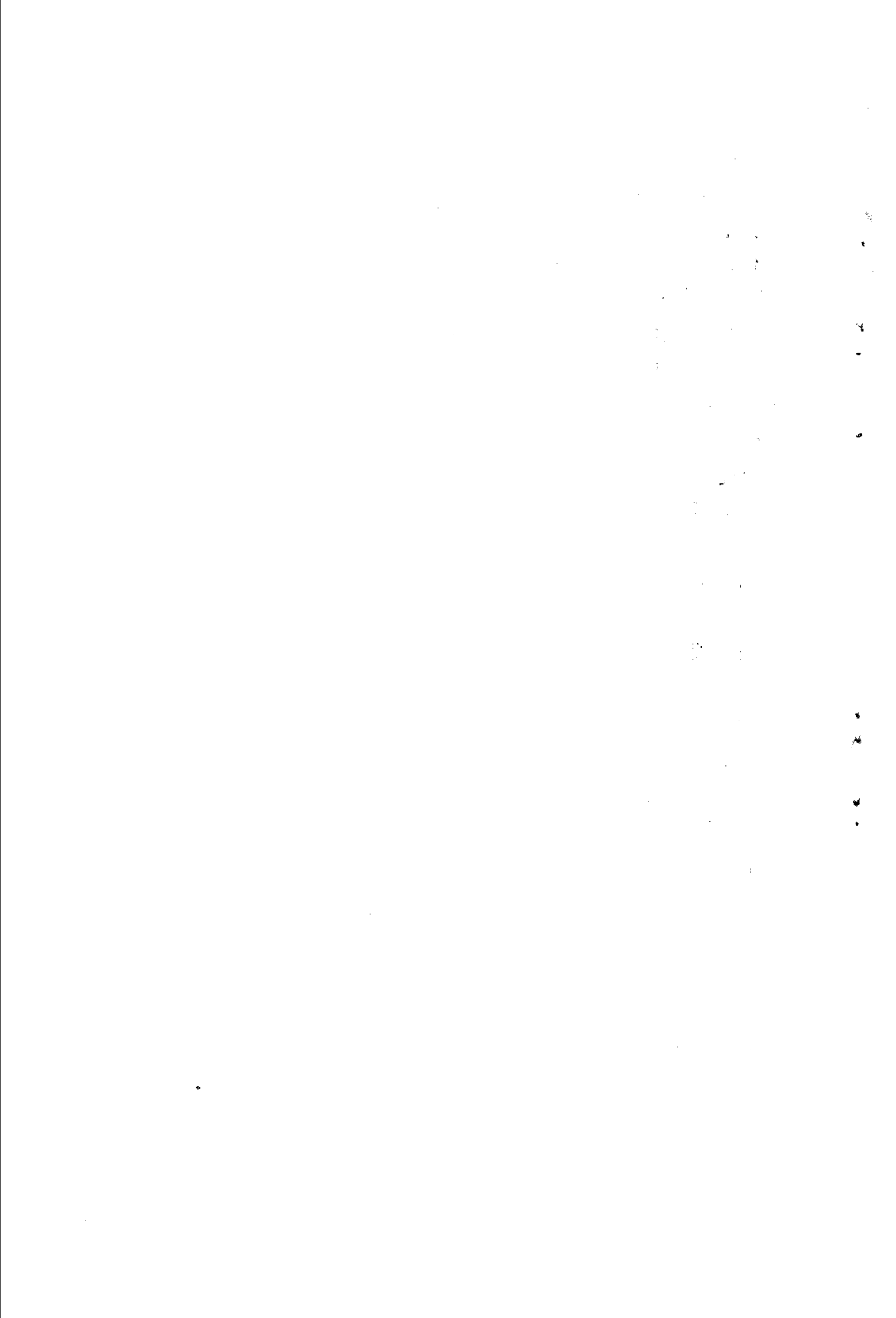
友谊是可贵的，但更为可贵的是学术上严肃的切磋琢磨。因为没有互相的讨论和批评，就不会有学术上的进步。虽有这么多朋友的帮助和合作，但限于作者的水平，加以中国地大，人多，“语”博，书中错误之处一定不少，没有注意到的语言事实自然更多。所以，作者恳请读者随时提出各种意见，烦请北京大学朱德熙先生转桥本万太郎，或径寄日本国(114)东京都北区西原4-51-21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桥本万太郎，均无任欢迎。

这本书符号繁多，款式复杂，北京大学出版社乐于出版，北京怀柔县印刷厂细心排印，作者深表谢意。

作 者

1983年7月13日于东京

3 ·



前 言

本书所论述的，是作者1972年归居远东后，先后在朝鲜半岛(1972年)、香港(1973年)、尼泊尔(1975~76年)、苏联中亚(1976~77年)等亚洲大陆各地考察时涌现的设想，现在提供从事语言学的行家探讨；为了便于一般读者阅读，尽量写得通俗些。

本人出生于远东，素有研究亚洲诸语言的兴趣。年轻时代在北美重新接受专业教育，后又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十年之后回来一看，亚洲的一切是那么新鲜，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发现。我痛感对亚洲的无知。从这以后，不管到亚洲哪个地方，不管作何种语言的调查，每当碰到新的现象，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脑际：这些现象如果在汉语或自己的母语日语里又该怎样。作为一个亚洲的语言学者，这种想法应该是很自然的。下列文章和演讲便是我的那些不成熟的想法（以发表前后为序）：

（1）〈汉语南北方言的“体（态）”性质〉——1974年9月2日，于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一般研究计划会议上宣读。

（2）〈亚洲诸语言的地理类型〉——1975年1月27日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语言学研讨会上演讲。

（3）〈汉语的历史和类型〉——1975年4月26日于

(日本)中国语学会关东支部例会(东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上宣读。

(4)〈亚洲大陆语言的接触〉——1975年4月30日于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所内研究会上宣读(内容提要见《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通信》第24号36页)。

(5)〈汉藏语语言结构类型多样性诸问题〉——1975年10月24日于第八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上宣读(内容提要见*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No. 3, pp. 49—65)。

(6)〈语言的农耕民型扩散和畜牧民型扩散〉——1976年7月21日于第一届日美教育文化协作讨论会上宣读(内容提要见*Genetic Relationship, Diffusion and Typological Similaritie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No. 1, pp. 1—14)。

(7)〈类别词本质〉——1976年8月21日于SIL(国际语言学夏季讲习会)东京讲习会(东京神学大学)上演讲。

(8)〈汉藏语中含类别词的句子来源〉——1976年10月22日于第九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斯堪的纳维亚四国合办的亚洲研究所)上宣读(内容提要见*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No. 7, pp. 66—78)。

(9)〈亚洲大陆语言类型的推移〉——1976年10月26日于列宁格勒日丹诺夫大学演讲。

(10)〈东亚、东南亚的语言地理类型学〉——1976年10月29日于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莫斯科)演讲。

(11) <东干语的地理类型学特征和东干语言学的任务>——1976年11月5日于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伏龙芝市)演讲。

(12) “声调和重音”研究讲习会: <关于汉语与东干语>——1976年12月3日于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一般性研究计划主办的专题研究讲习会上演讲。

(13) <亚洲的日语——地理类型学上的推论>——1976年11月27日于东京都立大学方言学会第148届研究会·日本言语之会上宣读(内容提要见《都立大学方言学会会报》第71号第1~8页)。

(14) <语言地理类型学诸问题>——1976年12月17日于东南亚八国合办的区域语言研究中心(新加坡)宣读。

(15) <亚洲诸语言的地理类型学>——1976年12月28日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讲演会(台北市)上宣读。

(16) “声调发生论”研究讲习会: <关于汉语>——1977年1月29日于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一般研究计划主办的专题研究讲习会上演讲。

以上都曾以公开讨论或演讲的形式,征询于大洋两边的师友同学,并承蒙给予多方面真诚中肯的意见。其中主要部分已于本书中介绍。

笔者从来不曾想把自己这样不成熟的看法汇集成书。只是由于河野六郎博士的好意,并为我创造了条件,加以弘文堂编辑部重松英树氏的热忱,才得以勉力完成。如今写完一看,更感到自己是多么仰赖于师友。

“地理类型学”这一课题,最初的启示还是在学生时代

从河野博士的教诲中获得的。他说：“桥本同学，如果从语言区域的角度来考虑藏语，那可真有趣！”这一下我才彻悟。他说的是这样的事实：藏语在词汇方面和汉藏语系大有关联，然而在句法方面更象阿尔泰语；看看它的语言地域，也的确分布在汉藏语和阿尔泰语的中间。不过，为了防止误会，要特别声明，河野博士可并没有劝过我写这样的书。引述上面的话，只是表示笔者久久难忘，同时根据自己的理解做了说明，绝没有要河野博士为书中任何一个谬误负责的意思。笔者深恐素来在学术上严于律己的河野博士将为之蹙额。这里提到河野博士，虽然明知会给他添麻烦，但无论如何不得不向博士致谢。

不管启示从何而来吧，把笔者终于吸引进富饶的亚洲语言学领域的是，1968年秋在新英格兰美国东部七所大学（所谓“常青藤联大”）创办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的十几位语言学界同事——其中元老包括白保罗，新手包括维廉·路易斯·巴拉德；若是没有他们同志式的鼓励和联络，我也许永远是个“性急如火的生成转换语言学者”（a fire-eating transformationalist）。我们的学会创立以来，不到几年，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大组织。而今秋恰逢十周年，笔者谨以拙作表示深切的感谢。

然而，更应该对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的同事和有关人员表示谢意。假如没有这个独特的研究所的推动和启发，我的这种研究就根本不可能进行。同时令人难忘的，是以往多年为我提供现场研究可能的各个机构及有关人员的帮助。

本书旨在根据亚洲语言的现象，为现代语言学开辟新的途径，并为此提供线索，揭示矛盾。读者也许会感到，以此

为宗旨的书，印欧语谈得太多了。确实如此。其所以这样，是因为有与笔者同代的人所受的北美语言学正规训练的背景；而且，既然涉及到语言研究的根本原则的讨论，那就不可能回避印欧语言学这一来自上世纪的历史产物，因为过去所谓系统的语言研究就是印欧语研究。在正文中也提及，语言地理类型学并非只适合于亚洲。不管怎么说，没有“欧洲”也就不会有“亚洲”这个概念，而且恐怕谁也不会想到把中亚和日本、印尼、中国等联系起来考虑。事实上，大家会注意到，作为整体的“亚洲”，至今还是个“假设”或“虚构”。在大洋两岸受过教育的我，暂时还不想谈这个“虚构”。我以为，本书至少于显示亚洲大陆在语言结构类型方面是一个连续体（continuum）这一点上是成功的。至于是否真的成功，当待读者判定。

在本书所展开的冗长的论述中，例外现象可以举出好些，疏忽之处也在所难免。为此，笔者垦请读者批评指正。但是，不管举出怎样的例外，本书所指出的结构类型上“纵”和“横”的推移模式存在于亚洲语言中的这一事实，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证明责任”（burden of proof）。规律总是有例外的。因此，只是指出几个例外并不能推进学术。假如有人要提出这个命题的对立方面，则必须先证明这个命题不能成立，因为他也负有“证明责任”。对于这样的逆命题，笔者是十分欢迎的。

最后，交代一下本书的体例。为使一般读者易于入门，尽量少用记号；文字除了汉字、拉丁字母、西里尔字母外，一律用转写。汉语的方言资料，本来要用音标标记。因为在